

◀ (上接14版)

一些人则背负沉重“时间负债”，沦为时间的奴隶。从时间价值的角度来看待人们的消费行为，会有一些别样的体会。比如购物，有的人喜欢直奔品牌店精挑细选，一分钱一分货，那是追求时间的“舒适化”；有的人乐于去往大卖场看基本款，目标明确，物美价廉，快速购物，那是追求时间的“高效化”。如果只从消费的表面上看，似乎体现了贫富两极分化，实际上这也可能只是时间价值认知与时间优化策略上的两极分化。

时间价值和“获得感”分化的另一个时代之感在于，人类往往不能善待和珍惜技术进步带来的“节约时间价值”。在时间碎片化的当下，仍一味致力于“时间的高效化”，就如同耗费漫长时间进行“磁盘清理”，只是将边角料的“存储空间”重新归并整理，旨在聚沙成塔、积少成多，从投入产出的回报而言却可能代价高昂。可悲的是，如此节省出来的时间，并未投入到创造性活动甚至一般休闲活动之中，办公自动化和智能化并没有使人们摆脱庸碌的低水平重复性劳动。比如，以提高办公效率为初衷的系列办公软件，反而创造了办公室工作量新的增长点，以至于做PPT本身成了多少白领不可承受之重负，而PPT技巧培训相关服务则发展成一套完整的产业链条，赚得盆满钵满。这种依靠增加无谓的劳动时间赚取加班费的方式，也是国人十分熟悉的“五加二、白加黑”，与提升时间价值的初衷完全是背道而驰。

时间资本主义条件下，城市只会更大、更拥挤。因为高附加值服务业的发展，使信息、人口、财富集聚于城市。城市化叠加全球化背景下的这种规模经济和产业集群特征，令每个企业都必须重新思考自身的分工定位，因为一般事务性工作都可以非常便捷地外包出去（这正是百货商场容易经营不善，但百货商场地下一层常常生机勃勃的重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埋头苦干，只会被工作所累，因为当普遍的技术进步提高了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之后，从事一般事务性工作的白领的不可替代性必然下降，他们也就面临着逐步滑向“时间破产”边缘的风险。

松冈真宏以收入和时间两个维度，划分出有钱有闲的创意阶层、有钱无闲的传统精英阶层、无钱无闲的“认真的穷人”和无钱有闲的“活在永无止境的日常里的人”四大象限。如果从代际视角加以比较，那么上一个技术革命时期的精英阶

层，其相对社会地位和生活质量，应该会比当下这一周期中的精英阶层为高。原因如前所述，技术进步使后一时代中创意阶层出现的难度增大了。这是一种层垒式堆叠的时间价值吞噬过程，多少聪明的头脑和高明的技术手段，首先被用于时间的加速，继而，这些节约下来的时间又被投入到庸常生活的简单再生产之中，创新的潜能被一步步消耗殆尽，直至回到常态。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人们勤劳而不富有？其实这并非某个国家特定的问题，而是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这一轮产业和技术革命造就的普遍态势。被瓦解了的传统社会白领，逐渐从第二象限进一步跌落到第三象限，沦为无钱无闲、整日瞎忙的“认真的穷人”。后发国家的发展与腾飞主要是这个群体艰苦奋斗的结果，然而这种民族国家的持续崛起，不可能始终以这个群体生活质量的固化甚至恶化为代价。美好生活不可能脱离时间，无暇享受的生活断然不会是美好生活，而追求美好生活的首要任务就是重新夺回时间。

上世纪90年代有一首流行歌曲叫《我想去桂林》，彼时刚刚在市场经济的海洋里鼓浪弄潮的中国人，已经体会到时间与财富之间的巨大张力：“我想去桂林呀我想去桂林，可是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钱；我想去桂林呀我想去桂林，可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有钱没时间，有时间没钱，这正是“认真的穷人”和“活在永无止境的日常里的人”两个极端。尽管他们看似相异，本质上却如同分散在二、四象限的一对双曲线，遥相呼应，互为对偶，此消彼长。

唯一化解了时间与收入之间对立状态的是第一象限的创意阶层，他们需要频繁地与人打交道、头脑风暴，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众创空间要被设计为一个开放空间、共享空间，甚至纯粹就是一个休闲咖啡馆格局的原因所在。创意阶层有着更为自由的工作时空，八小时内外浑然一体，职业与兴趣相得益彰。

这场伟大的互联网技术革命，成功地进阶为一场时间的争夺战、保卫战，并将引发社会阶层的重新洗牌。在击碎了传统中等收入群体的优越感信条，甚至诱发某些群体的焦虑和危机的同时，完成社会结构的整合与阶层秩序的重构。经此一役，大量时间消耗于“一地鸡毛”事务性工作中的传统白领，将面临更加艰难的处境。而在老龄化与少子化并行的历史进程中，具有一技之长的青壮



均为资料图片

年蓝领将有望进入新的上升区间，与创意阶层共享时间资本主义的荣光。

三

时间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必然趋势是公私融合。在这里，公与私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这一趋势背后的社会基础在于，服务业特别是高附加值服务业已发展到相当规模，劳动就业人口在三大产业之间的结构比例相较于工业化时期有了质的变化。传统的制造业生产空间是固定而僵硬的，劳动者必须按照规程，身着统一工作服进入生产车间，在工作期间无暇处置私事。这既是泰勒制的工作流程所框定的制度格局，也是福柯意义上的“全景敞视”景观所预设的人身控制。一心不得二用，与其说是工业经济时代劳动者普遍的职业伦理，毋宁说是严苛制度环境下的别无选择。

专业技术人员和白领阶层规模的扩大和地位的上升，宣告了后工业社会的降临，也拉开了时间资本主义的帷幕。白领的工作环境是办公室，这是绝然不同于工厂生产线的另一种空间结构。而高端服务业白领的职业特点也需要他们随时离开座位，或外出调查，或拜访约见客户，他们的价值是在频繁的人际交流中创造出来的。因此，他们拥有比传统制造业工人远为自由的时空结构，这种结构也天然地打破了公私截然二分的界限。智能手机的出

现，加速了这个公私融合的趋势。试想，从事金融、咨询和商务领域的高级白领在其通勤、出差乃至办公室等不同环境中，在使用微信查看留言、登陆邮箱查收邮件时，公与私能够截然分开吗？显然不能。那他们的上司就不怕他们在工作时间干私事、接私活，“出工不出力”、“磨洋工”吗？饶有趣味的是，似乎很少有企业会像防贼一样防范白领们“盗窃”工作时间。

从历史上看，第一产业是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也就是工作与生活或公私二者合一的，居住地(村落)与工作地(耕地)毗邻，但在时间上二者仍然是不同步的。农业劳动投入与农业收成之间未必完全正相关，而且农业劳动时间与农作物的生长和产出是两个相互分离的过程，不可能立竿见影。第二产业成为主导产业之后，才有了公私之分，工作是一码事，生活是另一码事。工业要求人财物各生产要素的集中，集中才有效率，但集中也侵吞了私人生活。马克思、恩格斯高度关注的劳动者住房问题，并提出住所与工作场所相分离的道义出发点，就是为了保障工人的生活空间与时间不被资本所侵夺。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早期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公司镇”(company town)模式，类似的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因资源而兴的各类资源型城市、紧靠工厂建造的各类工人新村与职工宿舍，实质上都在压缩生产与生活之间的时空隔阂，使之无缝对接，以便最大限度

地剥夺或获取“剩余时间”。现在，第三产业成为主流的后工业社会，在移动互联网全盘改组社会基础设施的背景下，人们又重回一种公私融合的状态，但这必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业模式。在新的场域中，劳动者自行安排时间在公与私之间的分配，企业组织则只看绩效，“无问西东”。

生产与生活的公私融合，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平衡。在时间碎片化的当下，但凡需要呵护创意、激励创新的组织，都难于一刀切地为工作与生活划定一个明晰的界限：工作到此结束，生活由此开始。电话、电视、电脑、手机，随着这些媒介载体逐一进入生活，家庭内部的空间结构也必然要被重新定义。晚餐时同时进行电话会议，陪孩子看电影时顺手发一封邮件，节假日的夜晚接到上司布置工作的微信后在家中“加班”熬夜……凡此种种，与工作期间回复家人的私信或留言这类“假公济私”相比，恐怕前面列举的各种“化私为公”的场面也并不鲜见。

技术改变了时空。生产与生活、公共时空与私人时空被共同拖拽进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对于“公私不分”有着丰富历史传统和生活经验的中国人，也许对此并不陌生。新近就有学者提出了从“社会治理”向“生活治理”演进的观点。“在中国人的社会治理实践中，对私人生活的治理由来已久，这是一种由政治传统和文化传统耦合形成的治理传统。”(熊万胜：《社会治理，还是生活治理？》，《文化纵横》2018年第1期)不过，人们在很短的时间内跨越传统而至现代、后现代，经由农耕文明时代乡土中国、熟人社会“开门过日子”的一种朴素的开放性，到“不和陌生人说话”的冰冷理性，再到忽如一夜春风来、热情拥抱各种“共享”模式的共享经济、共享发展阶段。眼下，当迎面遭遇时间资本主义浪潮及其背后社会转型力量新的强大冲击时，人们是否能够平滑个中风险，平复自身压力，进而在一路上“赶超”的现代化道路上，找回丢失的时间，充盈自己的人生呢？目前看来，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能寄希望于每个人的自觉和修行。技术的变迁正在迫使人们成为吉登斯所谓自反性的个体。在这个意义上，它对现代人的成长是有好处的。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形势与政策教研室)